

年内168名公募基金基金经理离任 多人“奔私”后升任高管

■本报记者 王宁

与去年同期相比,今年以来公募基金基金经理离任人数变化不大,但角色转换大有不同,部分公募基金基金经理在“奔私”后担任高管职务。9月9日,《证券日报》记者对东方财富Choice数据梳理后发现,今年以来,公募基金离任基金经理人数已达168人,与去年同期离任158人相比差别不大,但在离任的基金经理中,“奔私”后的职位却有较大变化。

一位北京私募机构高管向《证券日报》记者透露,由于今年市场环境较好,A股凸显投资机会,基金赚钱效应明显,为基金经理提供了更多选择。

东吴基金 7名基金经理离职

《证券日报》记者对东方财富Choice数据梳理后发现,今年以来,公募基金合计已有168名基金经理离任,与去年同期相比,今年离任的基金经理人数略有增多,去年同期为158名。其中,东吴基金人数最多,已有7名基金经理离任。其次是嘉实基金和国泰基金,年内各有6名基金经理离任。

在新聘基金经理方面,今年以来已有329名加入公募。其中,广发基金和华夏基金新聘基金经理人数均在10名以上;其次是大成、广发、汇添富、申万菱信等四家基金公司,年内新聘基金经理均有7名。今年以来全市场新聘基金经理人数与去年同期相比也几乎持平,去年为330名。截至目前,年内全

市场基金经理人数为2336名,与去年同期的2091名相比,增加11.71%。

从现有基金经理人数来看,目前华夏、博时、嘉实、南方等四家基金公司拥有的基金经理人数最多,均在60名以上;其次是广发、富国、易方达、工银瑞信、银华等五家基金,拥有的基金经理人数在50名至60名之间;此外,汇添富、招商、鹏华、华安等四家基金公司拥有的基金经理数量在40名至50名之间。

年内除了基金经理变动明显外,高管变动也较为频繁。Wind数据显示,年内已有91家公募基金的高管发生221次变更,其中有16家公募基金的董事长就累计变更30次,31家公募基金的总经理累计变更62次。

8月份是今年公募基金高管变更次数最多的一个月,有23家公募基金高管发生40次变更。其次是4月份,有22家公募基金的高管进行39次变更。此外,7月份也有20家公募基金进行了37次高管变更。

基金经理“公奔私” 多人升任高管

这些基金经理离任后的去向也成为业内的关注点。《证券日报》记者获悉,多名公募基金经理在离任后选择了投奔私募,且不同程度地升任高管之职。

其中,前大成基金研究总监王祥日前加入上海聚鸣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聚鸣投资”),担任公司副总经理、聚鸣匠私募证券投资基金系列产品



曾华/制图

的基金经理。巧合的是,聚鸣投资的法定代表人刘晓龙也是“公奔私”的一员。根据中基协公示信息,刘晓龙在2016年成立聚鸣投资之前,曾先后就职于广发基金和交通银行,分别任权益投资部总监、基金经理等职务。

与王祥类似的,还有多位明星基金经理也选择了“奔私”。原富国明星基金经理于洋持股39%的上海钦沐资产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近期完成私募管理人登记,于洋为该私募的自然入股东。中基协公示信息显示,在该私募投研部任职的罗林,此前曾在富国基金研究部、专户投资部任职研究员、基金经理,任职时间长达10年之久。

此外,原东方红资管副总经理、公募冠军林鹏创立的上海和谱汇一资产管理也于今年8月份完成私

募基金备案。中基协公示信息显示,林鹏作为该私募基金的法定代表人、董事长,持有该私募65.57%的股权。该私募的另一个股东是上海璟昆信息科技有限公司,持股比例为34.43%。在此之前,林鹏曾担任东方证券资产管理总部专户投资经理、研究所研究员。今年5月份,林鹏在离任东方红时曾表示:“将离开培养我的东方红,追求长久以来的创业梦想,这是一个依依不舍但经过深思熟虑的决定。”

一位北京私募机构高管对《证券日报》记者表示,今年市场环境良好,A股市场的结构性行情提供了很多投资机会,赚钱效应显现,为基金经理提供了更多职业选择。“奔私”担任高管有两个好处:一是投资更加灵活;二是担任高管后,有更多的成长空间。

银行业再现亿元级罚单 涉房信贷违规仍是高发区

■本报记者 彭妍

监管出重拳,银行业再现亿元级罚单。日前,银保监会官网披露称,前期,中国银保监会严肃查处一批违法违规案件,对包括四家股份制商业银行在内的五家金融机构及相关责任人员依法作出行政处罚决定,处罚金额合计3.2亿元,其中有两家银行被罚金额均超1亿元。

上述被罚金融机构的违法违规行为,涉及贷款、同业业务、理财业务、内控等诸多领域,其中涉房贷款违规依然是吃罚单的“高发区”。

据《证券日报》记者不完全统计,今年以来截至9月10日(以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日期为准),包括银保监会、银保监会、银保监会分局在内的金融监管系统,对商业银行(包含个人)开出的罚单数量至少超过2000张,其中不乏千万级别以上的大额罚单。

日前,民生银行发布的公告显示,因为在展业中存在多达30项违法违规行为,被罚没合计1.08亿元,这也是今年以来银行业收到的罚金最高的一笔罚

单。其中包括:没收违法所得296.47万元,罚款10486.47万元,并对8名责任人员给予警告并分别处罚款5万元的行政处罚。被处罚的8人多为民生银行多地分行管理层,包括分行行长、支行行长以及部门副总经理等。

无独有偶,还有一家股份制银行因多达31项违法行为收到亿元级罚单,罚款共计1.01亿元,并对7名责任人给予警告并处罚款共计70万元的处罚。

涉房类贷款违规,往往成为银行受到高额罚单处罚的一大诱因。上述被罚1.01亿元的股份制银行,在罚单列举的31项违法违规事由中,有多项与涉房类贷款有关,其中包括:向房地产开发企业提供融资,用于偿还股东垫付的土地出让金;通过理财非标投资向房地产开发企业提供融资,用于缴纳土地出让金;以保险类资产管理公司为通道,违规将存放同款项项倒存为一般性存款等。

今年以来,银保监系统开出的千万级别罚单并不少。银保监会8月份公布的信息显示,有多家银行收到千万级罚单,其中包括国有大行、股份制

银行和城商行。在上述多张千万级罚单中,银行的违法违规事由无一例外都涉及房地产相关业务,其中违规涉房贷款仍是监管的重中之重。由此可以看出,监管部门对贷款资金违规流入房地产现象的监督和处罚力度在不断加大。

招联金融首席研究员董希淼在接受《证券日报》记者采访时表示,强监管、严监管已成常态化,后续除了信贷领域的违规外,还有信息安全、隐私保护、大数据保护以及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等方面,也会成为监管的重点。防止资金违规流入房地产市场,有两个意义:一是防止经济过度房地产化;二是防止房地产过度金融化。从根本上,都是为了更好地坚持房住不炒的基本定位。

从今年以来整体罚单情况看,无论是数量还是处罚金额,都体现出监管力度和处罚力度在不断加大,特别是涉房贷款违规方面更是银行违规罚单的重中之重。

易居研究院智库中心研究总监严跃进在接受《证券日报》记者采访

时认为,监管部门对违规银行开出大额罚单的做法,体现了金融政策从紧的导向。今年银行贷款额度相对充裕,不排除出现很多违规或过于任性的贷款内容,导致各类贷款风险增大,甚至会影响贷款秩序。大额罚单的开出,是为了更好落实防范金融风险的政策导向。

“金融业的自我革命,不能只依靠金融监管部门”。完善金融机构的公司治理机制,正成为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的重要抓手。公司治理是现代企业制度的核心,对于经营货币信贷的金融业而言更至关重要。目前,我国金融业的治理既存在“内部人控制”问题,也存在“大股东控制”现象。董希淼进一步表示,下一步应抓住完善公司治理这个基础工作,从股东资质、关联交易、组织架构、考核激励等方面着手,理顺和完善公司治理体系。同时,紧抓影子银行及交叉金融产品风险等重点问题,进一步降低同业、理财、表外等业务的层层嵌套,打击任意加杠杆、加链条和监管套利等违规行为,规范合作业务的发展,减少资金空转。

进一步优化布局 年内上市券商分支机构撤出40家

■本报记者 周尚仔

作为证券公司的基层经营单位,也是券商获客的重要窗口和营销渠道,券商分支机构的动态颇受业内关注。

今年以来,券商对分支机构的调整越来越频繁。据《证券日报》记者不完全统计,年内已有5家上市券商获批新设分支机构35家;有10家上市券商获批撤销40家分支机构。9月份以来,已有海通证券、太平洋证券、天风证券宣布各撤销一家营业部。

优化资源配置 券商加速裁撤分支机构

《证券日报》记者了解到,9月份以来,已有海通证券、天风证券、太平洋证券3家上市券商宣布撤销营业部。其中,海通证券、天风证券均是今年第一次撤销营业部。

海通证券决定撤销上海宣化路营业部,该营业部原有的客户、员工和经纪人将整体并入上海余姚路证券营业部。海通证券表示,此次撤销营业部是为了优化资源配置,实现资源整合、优势互补,形成规模效应和核心竞争优势。天风证券也是为了进一步优化营业网点布局,决定撤销深圳平安金融中心营业部。太平洋证券则决定撤销厦门湖滨南路营业部。

《证券日报》记者发现,光大证券是今年以来撤销营业部最频繁的一家券商,上半年几乎每个月都会有营业部获准撤销。今年以来,光大证券已发布7条获准撤销营业部的公告,共计获准撤销位于天津、苏州、唐山、鞍山、广州、佛山、上海、成都等地区的10家营业部,撤销理由均为进一步优化营业网点布局。

此外,今年以来还有多家券商撤销了营业部。其中,国海证券获批撤销7家营业部;国元证券获批撤销7家营业部;山西证券获批撤销2家营业部;西部证券、浙商证券、东兴证券均获批撤销1家营业部。

此前,上市券商撤销营业部较为常见,但撤销分公司的情况并不多。但今年以来,券商对分公司的态度也有调整,国海证券和广发证券已分别撤销1家分公司。

《证券日报》记者了解到,个别券商裁撤分公司,是出于分支机构整体调整的考虑。一位券商人士向《证券日报》记者介绍称,“传统的分支机构成本高企,如何用好分支机构的资源很重要。如果经营不善,撤销也是及时止损。未来,券商网点布局将会不断完善,未来将带动券商总体业务的发展。”

今年以来,国海证券已获批撤销9家分支机构,包括其发源地所在的广西地区7家营业部及桂林分公司。对于此举,国海证券表示,“正进一步整合分支机构布局,优化资源配置,持续加强金融科技运用,优化线上服务平台,丰富业务场景和资讯内容,建设客户积分体系,提升客户体验和黏性。”

券商还在财富管理业务上不断加大科技投入与财富建设。一家上市券商透露,“公司现在的业务采用集中运营模式,提升了业务运营的质量与效率,降低了人力成本,不断推动营业部向营销服务中心转变,提高了生产力。”

中信改革发展研究基金会研究员赵亚娟向《证券日报》记者表示,“金融机构线上业务发展情况良好,不但可以降低费用,便于管理,还方便了客户。随着5G网络的建设,预计金融机构未来会更加倚重线上业务。”

5家上市券商 获批新设35家分支机构

在获批新设方面,年内已有5家

(上接A1版)

此外,从投入方面来看,技术研发是蚂蚁的一大重要支出。2019年公司全年技术研发投入高达106.02亿元,而此次IPO募集资金的40%都将投向技术创新及科技,30%将投向助力数字经济升级。同时,据招股书,截至2020年6月末,蚂蚁集团10646名员工中,技术研发人员占比超过了64%。

上述种种数据都有力印证了蚂蚁集团的“科创”属性。

在二轮回复问询中,蚂蚁集团披露在数字金融科技平台领域中与金融机构广泛开展合作的情况:截至6月30日,合作的金融机构超过350家,包括约100家银行、约170家资产管理公司及约90家保险机构。

此外,创新业务方面,蚂蚁链平台已在超过50个区块链商业化应用和用户场景开了先河,包括供应链金融、跨境汇款、慈善捐赠和商品溯源等。

因从事数字支付服务和数字金融服务的业务模式,合作金融机构与公司的合作模式受到金融监管行业的法规监管。此外,金融与科技服务的融合也受到监管的特别关注。

对此,蚂蚁集团方面强调,尽管相关监管体制、法律法规和政策不断变化,公司在持续经营过程中将始终坚持普惠、坚持开放平台模式、坚持守正创新。始终围绕上述原则开展业务,现有业务和合作模式在实质上将保持一致性和延续性。

A+H新股发行不低于30亿股

蚂蚁集团9月9日晚披露的上市招股书(会上稿)显示,本次A股、H股首

次公开发行的新股数量合计不低于A股和H股发行后总股本的10%。发行后总股本不低于300.3897亿股(绿鞋前),意味着将发行不低于30亿股新股。

据彭博社消息,蚂蚁集团上市的目标估值或达2250亿美元,这一消息备受市场关注,如果估值成真,上市后的蚂蚁集团市值将赶超美团,成为继阿里、腾讯后的第三大互联网上市公司。

“将蚂蚁集团类比为传统金融行业,应该是中国顶级的银行。目前工商银行市值是1.8万亿元,招商银行市值约为9500亿元,但是,这些银行的客户活跃度、年轻化及场景的延展性都与支付宝有一定的差距。”由曦向记者分析称。

不过由于蚂蚁集团的属性无法完全与银行对比,由曦也提到,可以从互联网行业角度补充分析,“美团点评与饿了么在本地生活的规模可以说旗鼓相当,我们几乎可以认为支付宝拥有了么的场景,而除了这一本地生活外,蚂蚁还拥有庞大的资管规模体量,这是美团所不具备的。美团点评目前拥有1.4万亿港元的市值,我认为蚂蚁集团的估值是合理的。”

2017年度、2018年度、2019年度和2020年1月份-6月份,蚂蚁集团分别实现营业收入653.96亿元、857.22亿元、1206.18亿元和725.28亿元。

“蚂蚁的收入与利润规模在互联网公司中拔得头筹,未来金融应用于场景之中,需要靠技术驱动,蚂蚁在这方面还有相当大的空间,今后估值仍然有上涨的预期。”由曦表示,在上市前,蚂蚁需要继续保持初心,能否在投资者对盈利预期的压力下,依然支持前瞻性的投资和战略安排,其实是一个值得考验和观察的视角。

大商所将丰富玉米产业链衍生品体系 助力企业化解价格波动风险

■本报记者 王宁

中国玉米供需结构正在发生改变,在库存下降、市场需求提升的背景下,加大进口已成趋势。在9月10日举行的“2020年中国玉米产业大会”上,多位业内人士表示,目前中国粮食安全整体形势仍然向好,但玉米供需缺口稍加明显。今年国内玉米库存下降,在需求增加的市场预期下,加大玉米进口将是大概率趋势。因此,企业要苦练内功,积极利用期货工具提高抵御市场风险的能力,提高市场经营风险管控意识。

《证券日报》记者从会上获悉,作为提供玉米衍生品工具的大商所,在玉米价格连续高位运行的情况下,将加快丰富玉米产业链衍生品体系,积极稳妥推动生猪期货上市,加快研发相关中下游期货品种。

长期供需关系偏差

玉米是饲料生产的第一大原料,产业供求形势变化不仅关系到饲料产业格局和饲料成本,也关系到农民和居民的“米袋子”“钱袋子”。

国家粮油信息中心粮油监测处处长李喜贵在会上表示,当前全球仍未走出新冠肺炎疫情危机,全球粮食安全形势“总量上的安全”和“结构性的不太安全”同时并存。中国粮食的安全系数

高,安全形势仍向好。但就玉米供需情况来看,已连续三年出现产需缺口,长期供需关系偏差。

据李喜贵介绍,我国实行玉米收储制度改革以来,主动调整优化种植结构,鼓励消费需求增长,玉米由产大于需向产需平衡转变,为加快消化不合理库存腾出了市场空间,去库存工作取得显著成效,实现了5年去库存的目标,年均消化5000万吨左右。去库存是分梯度渐进的,玉米先去库存,然后是稻谷和小麦去库存,因为稻谷和小麦的产业链短,消化渠道少。玉米的产业链长,消化库存不会引发粮价整体上涨。

路易达孚(中国)贸易有限责任公司北亚区谷物部总经理吴修春也表示,在国际市场谷物供应充足下,中国玉米库存存在下降,预计市场需求会增加,中国玉米进口将变为趋势。

吴修春认为,未来中国玉米市场的不确定因素主要是进口规模和进口量,这取决于国家政策以及国际基本面变化。中国玉米市场相对可以比较确定的是:未来中国对玉米可能会加大进口,并对小麦、水稻形成部分替代。不过,基于替代量和价格偏高会抑制消费的因素存在,中国玉米供需格局虽会进行调整,但并不代表价格会持续大幅上涨。

李喜贵表示,要理性看待玉米价

格上涨,价格波动最终是由供求关系决定,而不是预期和资金面推动。他预计,受供求偏差影响,玉米价格可能还会上涨,保持高位运行也属正常现象。但是,今年玉米价格的上涨潜力已被透支不少,后期的上涨空间可能已不大。

加快衍生品工具供给

作为管理风险的最佳工具,玉米期货和期权的推出深得产业企业青睐。全国畜牧总站站长、中国饲料工业协会秘书长王宗礼在会上指出,近十年来,玉米年产量从2009年的1.73亿吨增加到2019年的2.6亿吨,增幅达51%。在今年全球共同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国内全行业严防非洲猪瘟疫情的背景下,玉米价格持续走高,说明不确定性因素在增加。

“面对复杂多变的国内外形势,各家企业要苦练内功,积极利用期货工具提高抵御市场风险的能力。同时,要提高市场经营风险管控意识,准确把握宏观经济形势和行业发展形势,助力畜牧业健康发展。”王宗礼表示,今年玉米价格一路上涨,饲料行业和养殖企业经营了生产成本增加、产品价格上涨等因素的困扰。

《证券日报》记者从大商所处了解到,为了进一步满足产业企业的风险

管理需要,交易所将从多个方面加快衍生品供给。大商所党委书记、理事长冉华在会上表示,玉米期货上市27周年,有力地服务了国家粮食流通体制改革、收储制度改革和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接下来,大商所将加大改革创新力度,促进玉米产业持续健康发展。

冉华透露,交易所将有效发挥期货功能,丰富产业链衍生工具;不断优化规则制度,提高产业企业参与便利度;推广“保险+期货”模式,加大对农民和涉农企业保障力度;维护市场安全运行,保障行业发展行稳致远。同时,还将丰富玉米产业链衍生品体系,积极稳妥推动生猪期货上市,加快研发相关中下游期货品种。紧紧围绕聚焦服务产业企业,推动汇聚产业龙头企业等参与建设大商所场外市场,打造大宗商品生态圈,建设大宗商品价格信息中心、交易中心,满足包括玉米产业链在内的不同客户的多样化需求。

冉华表示,交易所将进一步提升品种功能和市场运行质量,例如,持续完善玉米产业链现有品种合约规则,“一品一策”促进功能发挥,推动合约连续活跃。此外,探索持续共享的产业服务新路径,拓展“保险+期货”的内涵外延,也希望玉米产业链企业科学合理利用期货市场有效管理价格波动风险,不断提升整个行业的抗风险水平。